

何齡修先生的学术与人生

孟彦弘

何先生这一代人,是从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过来的,常常会认为,一个像社科院历史所这样的单位,必须有些集体项目,才能显示出这个单位存在的必要。他在《中国史稿》第七册《后记》中说,“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人自为战的局面恐怕也不行,组织集体力量写出有价值的有系统的大部头著作,实在是这类机构的生命线”。在高校工作的学者,也常有类似的要求或期许。

何齡修先生欣开九秩,世愉先生主持的《清史论丛》拟出专号以示庆祝。他知道我自来所后,常常听何先生讲掌故,也知道何先生对我多有关照,所以特地囑我写文。2013年,清史室主办了隆重的庆祝会,不少受过何先生教泽的学人都赶来庆贺,如张玉兴先生就是从东北远道而来的。姚念慈先生特意精心准备了发言稿,详细谈了何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贡献。他觉得自己发言时间长了,中间曾两三次中断,问大家是不是自己发言时间太长;如果太长,他可即刻停止。大家都表示没有关系,他才又继续发言。中午一起聚餐,大家兴致都极高。这是我来所以后,极少遇到的为老先生庆寿的学术活动。

转年,《清史论丛》“何齡修先生八十华诞纪念专集”印了出来。我的小文在刊发前,呈何先生过目,他纠正了我若干记忆有误之处。所以,我说他身体虽时有小恙,但并无大碍。此后他还参加过所里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然后,又转年的秋天,我的新书出版后,赴何府拜谒呈时,老人已受阿兹海默症的折磨,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前一句还是清醒的话,下一句就离题万里,口里喃喃自语。其间,他还喊师母:“给小

孟准备行军床啊,不然,他晚上怎么睡呢。”师母连声应道:“好好好,我给他准备。你不要着急。”看着他,真是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现在,他已经走了,我觉得对他而言,是一种解脱。我想他也一定希望得到解脱。

何先生对清史研究史非常关注,他曾写过好几篇文章,谈清史学科的成立和发展。他认为孟森先生是清史学科的奠基人,他的学生商鸿逵先生曾花了很大的精力,整理出版孟森的著作,这就是为大陆学界广为使用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但直到商先生仙逝,孟森最为重要的未完成的著作《明元清系通纪》也未能以完帙面世。何先生认为学术界对孟森的表彰是不够的,于是接受了三联书店孙晓林先生的委托,编辑《孟心史学记》。承何先生不弃,命我帮他做些杂事。他常常跟我念叨,这件事,是他们这辈学人的责任;他们不做,了解孟先生生平的人越来越少,将来更难得有人做。为稿件的事,常陪他到三联。负责该书编辑、出版事宜的孙晓林、曾诚两位先生每次都会请我们在附近吃饭;在饭桌上,我们就总能津津有味地听何先生谈往事。于是,我们就一再撺掇他写出来。他动了心,就陆陆

续续,一条条、一点点写,渐渐成了一本回忆录的规模(这本《五库斋忆旧》,经刘小磊兄编辑,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也许是受此事的激发,在这前后,他写了一篇比较详尽的《自述》。

他1933年11月出生于湖乡县,祖上据说是咸丰年间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光绪年间,左宗棠在湘乡招兵,他的曾祖父投入行伍,随左氏西征。后来左宗棠内调,他的祖父也回乡成家,开设酒席馆;因自小学习烹调,技艺精湛,成为县中有影响的厨师,擅长燕窝烧猪、生炒肚丝、汤泡肚尖、蛋糕杂烩等名菜。他祖父生二子,他是长子所生,但出生即过继给他叔父。他的叔父即养父继承了他祖父的厨艺,并且能出蓝跨灶。有次,听他讲起往事,说过去的厨师都有些窍门或绝活。比如,某道菜,需要先将整只鸡过水煮一下;但这一煮,往往会使鸡皮发紧,不好嚼。他祖父就有一招,把水里先放点什么(他告诉我,我忘了),就可以使鸡皮不会变紧。2002年,我随侍何先生前往广州暨南大学参加纪念陈乐素先生诞辰百年的会议。那时,他已患帕金森病,但症状并不太明显,只是在夹菜时往往手抖得比平常更为厉害。他也不无自嘲地说,这病,就是不能紧张;平常在家也没事,

越是场面就越抖。所以我总坐他旁边,帮他夹菜到他小盘子里。一次餐会后,他笑着对我说,“你小子,不会吃”。我说,您怎么知道。他说,“会吃的,不是你那种吃法”。我忙叩问所以。他继续笑着说:“每道菜上来,只吃一点,是为品尝。像你那样,三下五除二,菜还没吃完,你就先吃饱了,还怎么品尝呢?你那是为吃饱。”我出生在北方农村,一出生就是“文革”十年,哪里能想到“品尝”呢。他又说:“品尝,不难,就是要多见世面。这跟读文章一样,读得多,自然知道高下好坏。”说完,又笑呵呵加一句,“你就是没机会吃好的。”他虽然深得祖父的疼爱,但大家庭的种种纷争,特别是他养母的被迫离异,还是让他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也增强了生活的自理能力。

1944年6月湘乡县沦陷时,他已在县城读完初小(三年级)。光复后,他进湘涟中心小学读高小。1947年秋入湘乡中学读中学。这期间,湘乡解放。1952年秋,湘乡中学高中部最高的两个班与湖南省立第十五中学(改名涟源第一中学)相应班合并,他转至涟源。1953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成为全国第一届历史系五年制的学生。他在《自述》中称:

我们有幸受到许多名师

的系统教育,其中有中国史的翦伯赞、向达、邓广铭、商鸿逵、吴晗、张政烺、汪篔、许大龄、陈庆华,世界史杨人梗、齐思和、周一良、胡钟达、张芝联,考古学夏鼐、苏秉琦,哲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潘梓年、李光灿等先生,都是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的精英、优秀代表。我们在世界观形成、品质修养、史学方法训练、历史基础知识积累等多方面,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汪先生上课下常给我们讲自己读马恩著作的体会,结合专业讲尤觉亲切易懂,听完后总感觉恍然有悟。邓先生强调学好理论,也要掌握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学),特别深入人心。在袁良义先生指导下,我学习明清史,阅读了一些明清史籍,特别是方志、别集。我的毕业论文题为《明代的山陕商人》,也在袁先生指导下顺利进行。这是我自选的课题。我学习傅衣凌先生,搜集了若干山陕商人的资料。结果我只写成大半,没有完篇。我感到不甚满足,认为傅先生用传统方法排比资料,没有进一步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做分析。我试着绘制了山陕商人资金流动示意图,但知识菲薄,思想幼稚,所做

(下转14版) →

← (上接12版)

20世纪的内忧外患在何先生身上留下的印记,在他晚年的病躯中体现尤甚。

我很幸运晚生了卅年。去年九月,拿到《清初复明运动》一书后,何先生给我题字:“我们相识许多年了。随着时间的延续,始知你在史学研究的层面上拥有开辟局面、善于创新的好功夫。孔夫子不相信妇女能研究历史,班昭以后果无之人,使他的这一谬论长树学界数千年,这是十分令人遗

憾的……这里的关键是理论。理论的创新能够产生除旧布新的社会后果,希望海英紧密地注视,果断地改进。长期受二竖折磨,字不成字,热望在精神实质上多加理解,便谅其他的过失。何齡修”。时间落款写了“20”两个数字,后面则说不记得了。我把着他的手写完了“17.9.5”这个日子。那天,他趴在吃饭的小桌子上,喝了一小杯水,还有一袋乳酸菌奶,一字一句写完这些字。这再次让我很吃惊!连何翔师弟都说:“这哪

里像重度老年痴呆的样子嘛!”勤奋的大脑颠覆了医生的诊断,人类的热爱能创造什么样的奇迹,在我面对先生时深深地理解了!一个晚期帕金森症病人,医生判定为“重度老年痴呆”的患者,居然还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而且基本上一气呵成,中间睡过一小会。他写完后,我看了几遍,发现有几个字认不出,就问他是什么字,除旧布新的“除”字,二竖的“竖”字,还有长树学界的“树”字,都是他自己帮我辨认的。我还有些贪心不

足,希望他能再多题一二本书,但他不干了,起身到旁边书架,取出一本邮票看起来,不再理会我和师弟、师母的叨叨。

过了一两周,我再去看他。谈起这本书,他还反复说这是“别的朋友出钱,让我顶名赠书,有愧了”,或者“多是读者(本人)掏钱,让我顶名赠书,有愧”。最后还写了“此多是读者自购,让我顶名题赠”的纸条,叨叨说要去市场请人刻成章子,印在书册扉页上。这个总在不停思考的大脑,

真的是从不空闲啊。即使是不再与现实对号入座的自言自语,也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忆反复回放。在或准确或变形的记忆和想象中,家国之思始终是这个“强势大脑”的主旋律。在丰沛情感的滋养下,他记忆的草原上牧草肥美,他在思维的世界里畅快驰骋。现在一切都成为了历史。

二零一八清明时节,三十年未见的寒潮中,谨以此为师父送行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